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3.03.11

“资源掠夺”还是市场与效率驱动？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动因研究

朱丽萌¹, 韩雨²

(江西财经大学 1.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2.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非持续发展的贸易和中国对非投资的快速增长,触动了西方在非洲的不安全感和对中国投资行为的质疑。本文以2005—2020年间中国对非投资44个国家为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和效率因素等对中国对非投资的影响。同时,将非洲国家划为低收入经济体和中等收入及以上经济体两类,进一步分析中国在非洲不同收入类型国家的投资动因。研究证实了本文提出的两个假设,即中国对非投资受到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与效率等综合因素的驱动;中国对非投资受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有限,且随着非洲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升正变得越来越小。资源寻求动机并不是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唯一动机,更不存在“资源掠夺”,市场和效率寻求动机才是其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资源掠夺;市场规模;效率寻求;中国对非直接投资

作者简介:朱丽萌(1963—),女,江西吉安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等相关研究;韩雨(1992—),女,安徽六安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非洲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0311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72064014)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3)03-0076-06 **收稿日期:**2022-03-05

一、问题的提出

商务部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大陆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由2003年的4.9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433.9亿美元,存量的年均增长率高达30.18%。近些年,非洲国家积极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引发了西方在非洲的不安全感和对中国投资行为的质疑。但是,中国对非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显著地受非洲东道国市场和效率的吸引。我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陆对非投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投资由采矿业转向了建筑业和制造业。一方面,在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例逐步增加。2018年,中国承担了超过30%的非洲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中国投资者越来越看中非洲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等发展潜力,而资源禀赋的吸引力随着非洲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正变得越来越小。2013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陆对非采矿业直接投资存量占比下降了5.8个百分点,且正在被制造业逐渐赶超。

中国对非投资的动因究竟是什么?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对非投资的主要动因就是攫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①;另一些学者指出,非洲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吸引中国投资的重要因素^②;也有研究发现,自然资

① Gold K L, Rasiah R, Kian T K.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Oil/Minerals Exporting Countr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 Sciences*, 2019(64).

② Chen W, Dollar D, Tang H. Why is China Investing in Africa? Evidence from the Firm Level.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18 (3).

源对吸引中国投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市场、效率、基础设施、制度等更为重要^①。造成这种争议可能的原因:一是已有关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动因的分析较少;二是大部分研究只选择了 20 多个非洲国家作为考察对象,样本数据具有局限性;三是现有研究较少考虑到中国在不同类型非洲国家投资动因的差异,需要进一步佐证中国对非投资的动因。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跨国投资动机理论起源于 Hymer 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他认为跨国投资是跨国公司基于相对于东道国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垄断优势而产生的行为^②。但该理论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不具备相对垄断优势时产生的投资行为,这导致了学术界更深层次的探索。Vernon 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当产品生命进入成熟和标准化时期,企业会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进而产生国际投资的行为^③。Buckley 与 Casson 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投资是企业通过内部市场代替外部市场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产生的行为^④。Dunning 综合上述相关研究,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跨国投资行为^⑤。Kojima 则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认为跨国投资是企业为了保持比较优势的持续不衰,将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国外而产生的投资行为^⑥。1981 年,Dunning 进一步完善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奠定了企业跨国投资动因的基础理论^⑦。本文以 Dunning 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主线,探讨中国对非投资的动因。

按照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投资动机可以分为自然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和战略资产寻求四种类型。自然资源寻求型是在某些原材料、能源短缺或成本高昂的情况下,企业为了寻求更高质量和更低成本的自然资源对外进行的投资;市场寻求型是指企业以通过开拓东道国或第三国市场为目的进行的对外投资;效率寻求动机是指企业利用要素禀赋、制度安排、需求模式等方面的差异以提高要素投入效率或实现规模经济而寻求海外投资;战略资产寻求动机是企业为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寻求品牌、市场营销、技术等战略资产进行对外投资。因非洲总体经济欠发达,受自身条件限制并不具备战略资产优势,因此战略资产寻求动机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自然资源禀赋对 FDI(外国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在经济欠发达,缺乏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初级阶段,东道国往往通过开发和出口自然资源吸引外国资本。此外,拥有丰富矿产和能源等资源的国家通常更能吸引外资。然而,随着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资源禀赋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是如此。有研究表明,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投资主要出于市场寻求动机,而在高收入亚洲国家,资源寻求动机不显著^⑧。非洲整体经济欠发达,不少国家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凭借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外资因此也成为其必然的抉择。但随着非洲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投资的产业逐渐多元化,非洲国家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在吸引中国投资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黎明等认为,因中国对非的投资在逐渐转向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故资源寻求动机在 2009—2014 年间并不显著^⑨。Fredrik 和 Uma 也认为,中国对中等收入非洲国家投资为市场寻求型,仅在低收入国家存在资源寻求动机^⑩。

市场寻求动机已成为世界各国以及我国对外投资的一个关键因素。当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时,以

① 陈岩,马利灵,钟昌标:《中国对非洲投资决定因素:整合资源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2 年第 10 期。

② Hymer S H.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Massachusett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③ Vernon 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6(2).

④ Buckley P J, Casson M. The Future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1976.

⑤ Dunning J H.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Proceedings of a Nobel Symposium Held at Stockholm, Palgrave Macmillan Publisher, 1977.

⑥ 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 Croom Helm Publisher, 1978.

⑦ Dunning 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81.

⑧ Kamal M A, Ullah A, Zheng J, et al. Natural Resource or Market Seeking Motive of China's FDI in Asia? New Evidence at Income and Sub-regional Level. Economic Research-Ekonomska Istraživanja, 2019 (1).

⑨ 黎明,夏昕鸣,朱晟君,贾灿飞:《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地理》,2017 年第 11 期。

⑩ Fredrik U-X, Uma S K.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Business, 2022(4).

扩大东道国市场为目标的对外投资可以避免因直接出口引发的运输成本,并通过了解东道国市场深挖商品和服务以进一步刺激企业对东道国的投资^①。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业和制造业公司将非洲视为巨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而对其投资^②。此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包括“第三方效应”,即通过东道国向第三国市场出口,以减少因直接出口面临的贸易壁垒。因一些非洲低收入国家享有出口到欧盟和美国的免关税、免配额等优惠贸易安排,这促使中国企业选择在这些非洲国家投资和生产,继而出口到第三国以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如 Sanfilippo 认为,除了自然资源以外,中国对非投资还有利用非洲低收入国家具有的制造业产品出口第三国的政策优势动机^③。

依托东道国要素优势以降低生产成本的效率寻求动机正在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当投资母国与东道国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时,企业利用国家之间的要素可获得性及成本差异来实现效率寻求动机,从而促使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活动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劳动力、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由于资本匮乏和高投资风险,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 FDI 在非洲具有显著的效率寻求动机^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也越来越积极地在海外寻找低成本的生产选择。东道国的效率因素、资源禀赋和市场规模对吸引中国投资都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东道国低劳动力工资对吸引中国资本有显著作用^⑤。劳动力成本如何影响 FDI?当劳动力成本上升至跨国企业无法承受的范围时,跨国企业将减少在该国的投资,将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Hou 等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质量较低的地区,跨国企业更偏好高工资以确保较高的劳动力素质;而在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地区,对低劳动力成本的偏好使得高工资抑制了投资的增加^⑥。

非洲国家虽然经济整体发展迅速,但由于国家众多且发展不平衡,其实际经济水平差异较大。本文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方法将非洲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在 44 个非洲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21 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占绝大多数^⑦。另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9 年非洲总人口约为 13 亿。其中 50% 以上的人口年龄在 15 岁至 64 岁,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 3.4%。基于非洲经济发展迅速且发展不平衡、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等特点,本文依据上述分析,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一:中国对非投资受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与效率等综合因素的驱动。

假设二:中国对非投资受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有限,且影响程度随着非洲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正变得越来越小。

三、模型设定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检验

本文将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规模、效率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分别采用自然资源租金^⑧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总人口数、人均 GNI 进行衡量。有关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分别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标(WGI)、每百人租用的无线移动电话数量、教育支出

① 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4).

② 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资源掠夺还是多因素驱动:非正规经济视角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③ Sanfilippo M. Chinese FDI to Africa: What is the Nexus with Foreign Economic Cooper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S1).

④ Okafor G, Piesse J, Webster A. The Motives for Inward FDI into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015 (5).

⑤ 饶华,朱延福:《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亚太经济》,2013 年第 6 期。

⑥ Hou L, Li Q, Wang Y, et al. Wages, Labor Quality and FDI Inflows: A New Non-linear Approach. *Economic Modelling*, 2021(102).

⑦ 23 个低收入国家包括贝宁、布隆迪、乍得、科摩罗、刚果(金)、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津巴布韦;21 个中等收入及以上经济体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博茨瓦纳、佛得角、喀麦隆、刚果(布)、科特迪瓦、埃及、赤道几内亚、加蓬、加纳、莱索托、毛里求斯、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舌尔、南非、突尼斯、赞比亚。

⑧ 自然资源租金包括煤炭、天然气、石油、矿产和森林租金。

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作为非洲国家治理能力、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

本文选取动态面板模型衡量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研究。本文所指的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仅为中国大陆对非直接投资。具体模型如下：

$$\ln OFDI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OFDI_{it-1} + \alpha_2 resource_{it} + \alpha_3 \ln pop_{it} + \alpha_4 \ln GNIC_{it} + \alpha_5 WGI_{it} + \alpha_6 \ln mobile_{it} + \alpha_7 education_{it} + \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 $OFDI_{it}$ 代表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存量, $resource_{it}$ 代表东道国自然资源租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pop_{it} 代表东道国总人口数, $GNIC_{it}$ 代表东道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WGI_{it} 代表东道国全球治理指标数值, $mobile_{it}$ 代表东道国每百人租用的无线移动电话数量, $education_{it}$ 代表东道国教育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百分比, α_0 为常数项, ϵ_{it} 为随机误差项。

因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问题,共选取中国在非洲投资的 44 个国家 2005—2020 年间的 704 组样本。其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所有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等获得。为了消除量纲和异方差的影响,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以及解释变量中的总人口数、人均 GNI 和每百人租用的无线移动电话数量进行了对数处理。为判断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相关系数对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计算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两两之间相关系数均低于 0.62。进一步采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方法,发现各变量的 VIF 值均低于 2.60,平均 VIF 值为 1.83。这表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表 1 混合 OLS、固定效应、差分 GMM、系统 GMM 全样本回归结果

| | (1) 混合 OLS | (2) 固定效应 | (3) 差分 GMM | (4) 系统 GMM |
|------------------|--------------------|---------------------|-------------------|---------------------|
| $\ln OFDI_{t-1}$ | 0.90*** (0.00) | 0.67*** (0.00) | 0.66*** (0.00) | 0.82*** (0.00) |
| resource | 0.00* (0.08) | 0.00 (0.50) | 0.01* (0.06) | 0.01** (0.02) |
| $\ln pop$ | 0.10*** (0.00) | 1.36*** (0.00) | 1.96*** (0.00) | 0.87*** (0.00) |
| $\ln GNIC$ | 0.11*** (0.00) | 0.39*** (0.00) | 0.74*** (0.00) | 0.65*** (0.00) |
| WGI | 0.13*** (0.01) | 0.26* (0.05) | 3.91*** (0.00) | 0.99*** (0.00) |
| $\ln mobile$ | -0.12*** (0.00) | -0.00 (0.93) | -0.19** (0.05) | -0.26*** (0.00) |
| education | -0.03** (0.01) | 0.01 (0.82) | 0.12** (0.02) | -0.12** (0.03) |
| 常数项 | -0.57* (0.06) | -21.28*** (0.00) | | -14.90*** (0.00) |
| AR(1) | | | 0.00 | 0.00 |
| AR(2) | | | 0.26 | 0.75 |
| Hansen 检验值 | | | 0.19 | 0.19 |
| 观测值 | 660 | 660 | 616 | 660 |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下显著;圆括号中报告的是标准差;Arellano-Band 自相关检验和 Hansen 检验给出的是 p 值。以下同。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系统 GMM 估计探究中国对非投资动因。系统 GMM 兼顾了差分方程与水平方程,并使用滞后的差分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因此更适用于短面板和有限样本,且可以解决弱工具变量的问题。为进一步检验系统 GMM 估计量是否有效可信,参考 Bond 等和 Roodman 的建议^{①②},将混合 OLS、固定效应、差分 GMM 的因变量滞后项的估计值进行比较。若差分 GMM 的估计值接近或低于固定效应的估计值,则采用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若差分 GMM 的估计值高于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且低于混合 OLS 估计值,则使用差分 GMM。

① Bond S R, Hoeffler A, Temple J. GMM Estimation of Empirical Growth Models. 2001.

② Roodman D. How to do xtabond2: An Introduction to Difference and System GMM in Stata. The Stata Journal. 2009 (1).

表 1 显示,本文对探究中国对非投资动因,采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 模型是恰当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与其滞后项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自然资源禀赋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显著正相关,表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吸引中国对其投资的因素之一。市场规模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反映了中国对非投资偏好那些市场规模更大的国家,这与多数文献的结论相同。代表效率因素的人均 GNI 显著为正,这一结论与冯伟等(2011)^①针对我国的样本研究得出的观点相同。东道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并非风险偏好型的。基础设施水平对吸引中国对非投资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为了弥补非洲的“基础设施缺口”。教育水平指标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在开放的要素市场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多,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性有可能越强^②。由此,佐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一个假设,即中国对非投资受到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与效率等综合因素的驱动。

为进一步验证中国对非投资受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主要与东道国的发展程度有关,将非洲东道国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及以上两组。同样使用上述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均表明系统 GMM 估计是可行的。因篇幅限制,以下仅给出系统 GMM 的估计结果。表 2 显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中,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均表现出与其一期滞后项、总人口和人均 GNI 呈显著正相关,与东道国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而自然资源禀赋仅在低收入国家中显著为正,在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中不显著;全球治理指标在低收入国家中表现不显著,在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显著为正。这就佐证了本文提出的第二个假设,即中国对非投资受自然资源的影响程度有限,且随着非洲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升逐渐减小,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在非洲进行“资源掠夺”的论断不符合实际。

表 2 分组系统 GMM 回归结果

| | (1) 低收入国家 | (2) 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 |
|-----------------------|--------------------|--------------------|
| lnOFDI _{t-1} | 0.86*** (0.00) | 0.87*** (0.00) |
| resource | 0.01*** (0.00) | 0.00 (0.12) |
| lnpop | 0.19*** (0.00) | 0.15*** (0.00) |
| lnGNIC | 0.25*** (0.00) | 0.25*** (0.00) |
| WGI | 0.05 (0.47) | 0.28*** (0.00) |
| lnmobile | -0.09*** (0.01) | -0.15*** (0.00) |
| education | -0.03** (0.01) | -0.05*** (0.00) |
| 常数项 | -2.89*** (0.00) | -1.93 (0.10) |
| AR(1) | 0.00 | 0.00 |
| AR(2) | 0.72 | 0.88 |
| Hansen 检验值 | 0.15 | 0.47 |
| 观测值 | 345 | 315 |

在上述基础上,使用矿产资源替代自然资源作为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3。相关结论与前面一致,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两个假设。

① 冯伟,邵军,徐康宁:《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我国 1990—2009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1 年第 6 期。

② IOM. Africa Migration Repor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ddis Ababa, 2020.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1) 全样本回归 | (2) 低收入国家 | (3) 中等收入及以上国家 |
|------------------|---------------------|--------------------|--------------------|
| $\ln OFDI_{t-1}$ | 0.84*** (0.00) | 0.88*** (0.00) | 0.87*** (0.00) |
| mineral | 0.02** (0.05) | 0.01*** (0.00) | 0.00 (0.70) |
| $\ln pop$ | 0.75*** (0.00) | 0.17*** (0.00) | 0.18** (0.01) |
| $\ln GNIC$ | 0.61*** (0.00) | 0.20*** (0.00) | 0.28** (0.02) |
| WGI | 0.77*** (0.01) | 0.01 (0.83) | 0.36** (0.03) |
| $\ln mobile$ | -0.32*** (0.00) | -0.11*** (0.00) | -0.19*** (0.00) |
| education | -0.12** (0.04) | -0.03** (0.03) | -0.07** (0.01) |
| 常数项 | -12.63*** (0.00) | -2.25*** (0.01) | -2.41 (0.18) |
| AR(1) | 0.00 | 0.00 | 0.00 |
| AR(2) | 0.58 | 0.68 | 0.82 |
| Hansen 检验值 | 0.16 | 0.13 | 0.88 |
| 观测值 | 660 | 345 | 315 |

注：本表 mineral 代表东道国矿产资源租金占 GDP 百分比。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在一定的资源寻求动机,但不是唯一动机,更不存在“资源掠夺”,且资源寻求动机主要与东道国发展程度相关,并随着东道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小。市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吸引中国的投资,且东道国劳动力成本整体处于低水平阶段,适度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积极性,从而创造更多利润,进一步吸引中国的投资。东道国基础设施和教育水平对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影响显著为负,而全球治理指标仅在低收入国家影响不显著,政局稳定与政府治理能力较为完善的非洲国家更吸引中国投资者。为此,要以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深化对非投资的深度与广度。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充分利用非洲国家较大的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较低和东道国向第三国市场出口方面的优势,促进中国对非投资更多地触及非洲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的提升和农业的繁荣。同时强化对非洲国家投资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增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以妥善应对非洲国家因频繁的政权更换、社会动乱等因素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Resource Plundering” or Market and Efficiency Driven ?

——Motivations of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Zhu Limeng, Han Yu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boosted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ausing Western unease and doubts of China’s investment behavior in the region. This study analyzed China’s investment in 44 African countries between 2005 and 2020 using the GMM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market size, and efficiency on China’s investment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and above economie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influenced by natural resources, market size, and efficiency, but the influe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is limited and decreasing as African economies develop.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is driven by market-seeking and efficiency-seeking, in addition to resource-seeking, which is only significa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Overall,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resource plundering in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Key words: resource plundering; market size; efficiency-seeking;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责任编辑 陈浩天]